

解读资源约束下的制度变迁

张荣德

摘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为社会提供了正面的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所以制度是重要的。根据诺斯提出的问题,在综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发展了诺斯的国家理论。交易成本是分工合作的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由交易成本决定的产权制度内生于资源约束。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我国的工业化历程以及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制度变迁 产权制度 交易成本 资源约束

一、制度、分工、交易成本与经济发展

诺斯(1981)指出,制度是博弈规则,制度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提供激励,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又决定了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增长,所以制度是重要的。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诺斯的理论具有特别的诱惑力,因为,既然制度决定经济增长,改革现有制度似乎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捷径。尤其是在前计划经济国家里,人们很容易将短缺、低效率和计划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由于产权制度是关键环节,所以,在前计划经济国家里,改革的矛头纷纷指向所有制。

这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起诺斯(1981)的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人们认识到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为什么在某些经济社会里会存在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产权制度的内生决定问题,即形成有效率产权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产权制度改革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或者说涉及到了产权改革的有效性

问题。

诺斯的国家理论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诺斯(1981)指出,国家由于其在界定产权方面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国家成为产权界定的主体。所以,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决定了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增长。问题是,国家为什么会界定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诺斯提出了国家在界定产权时受到的两个约束,即交易成本约束和潜在竞争集团的约束。诺斯的分析到此为止,没有对这两个约束进一步内生化的,即一个经济社会的交易成本状态是怎样决定的,利益集团的行为状态为何在不同社会有所不同。

林毅夫(1998)同样提出了产权制度内生论的观点,虽然他与诺斯走得一样远,但视角完全不同。林毅夫的论证是从发展战略同产权制度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展开的。林毅夫指出,产权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建

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一个资本匮乏的经济社会里实施工业化赶超战略的必然结果,而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又是发展战略调整的产物,所以单纯地强调产权制度的重要性是没有意义的。但问题是,与一国资源比较优势相悖的发展战略的确定是政治领袖拍脑袋的结果吗?政治领袖采用既定发展战略背后有没有更为深刻的经济理性因素?林毅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杨小凯(2001)对林毅夫的回答是,资源禀赋可以是内生的,如日本的汽车产业是在并不符合日本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产权依赖于政府的保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政府的掠夺倾向进行约束,因而要实行宪政。但杨小凯并没有比林毅夫走得更远,虽然布坎南(1980)忽略了对宪政的可实施性问题的讨论,但该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产生宪政的因素是什么?推动宪政的力量有哪些?难道宪政是一个决定制度的外生变量吗?难道最后要用偶然性和观念等因素来解释历史吗?

亚当·斯密(1776)认为,国家的财富状况(发达程度)决定于两个因素:(1)国民的劳动熟练程度、技能以及判断力;(2)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在上述两个因素中,对国民财富决定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一个因素。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的熟练程度、技能以及判断力的提高都是分工的结果。也就是说,劳动分工状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状态。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会限制市场范围的扩展呢?在斯密看来,交通运输状况限制了市场范围的扩大,他以水运的便捷与廉价来解释地中海各国以及中国东部数省农业的发展。斯密在这里的逻辑是:地理因素-运输成本-市场范围-分工-效率。

在斯密的分工框架中,分工是受分工成本约束的,进而,经济增长也受到分工成本的制约。在亚

当 斯密看来,这种成本是运输成本。然而,亚当·斯密仅仅理解了分工成本的一部分,运输成本固然是阻碍分工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仅仅考虑运输成本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分工的深化,各分工主体的知识日趋专业化,同时,生产性投资也必然日趋专用化,这为各分工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因为分工意味着合作,而随着知识的日趋专业化和资产专用性的日趋增强,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很容易被敲竹杠(held-up),合作的难度也必然越来越大。这也是一种对分工合作的阻力,当这种阻力足够大的时候,分工就难以继续,经济增长就会停滞。杨小凯(2000)指出,这种阻碍分工合作的阻力是交易成本,是由分工内生的交易成本,而亚当·斯密所谈到的运输成本是外生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阻碍了分工,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所以,从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出发,理解了交易成本也就理解了经济增长。而从产权理论出发,要理解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也必须首先理解交易成本的性质。

图1对相关理论的分歧做了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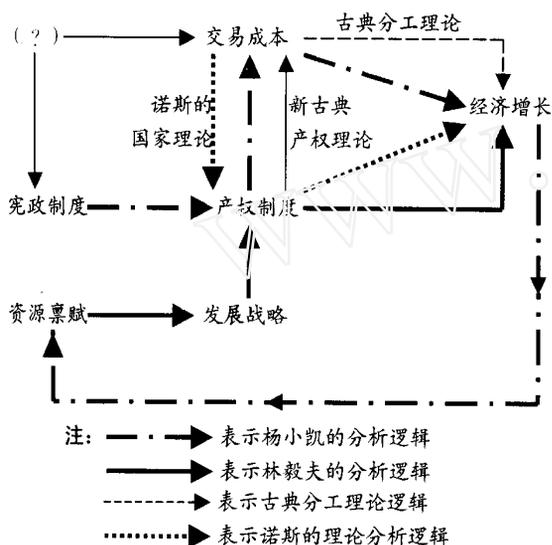


图1

当我们看到经济发达国家的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高度相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这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即产权制度决定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相关关系理解为一种因果关系,那么结论必然是:制度是重要的。但是,通过我们的上述分析,经济增长、产权制度、发展战略、资源禀赋、宪政等诸多因素实际上是相互纠缠交织在一起的。在图1中的上半部分,我们发现,古典的分工理论、诺斯的国家理论、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是缺少解释经济绩效的外生决定因素,即没有解释交易成本状态或者宪政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在图的下半部分,资源禀赋这一被林毅夫视为外生变量的因素,已经被杨小凯内生化了,所以也找不到藉以决定经济绩效的外生因素。

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我们不但要弄明白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更要弄明白其间的因果关系。

而要使理论逻辑超越思辨从而对我们的事业有所裨益,我们就必须找到可以操作的外生变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改革的历程以及今后改革的走向。无论是在古典的分工理论那里,还是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交易成本都是分析的核心因素,那么,我们就从理解交易成本入手。

二、对交易成本的理解

交易成本的定义有很多。科斯(1937)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主要包括谈判和签约成本。巴泽尔(1989)则指出,交易成本是为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肯尼斯·阿罗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运作的成本,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张五常进一步将这一概念抽象化,他认为,交易成本是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Dahlman(1979)从信息的角度出发,认为交易成本是由于信息不完善而导致的资源损失。Richter(1989)认为,交易成本是与契约相关的成本。威廉姆森(1985)认为,交易成本与人的机会主义动机、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以及资产的专用性有关。

以上定义分别表达了研究者对交易成本这一概念的深刻认识。但是,由于上述定义的针对性太强,是不同研究者分别针对自己的研究目的而进行的定义,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特定的交易成本定义,就必须对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成果进行研习,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们对交易成本这一概念的把握。

交易成本作为一个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分析工具,它总是同制度的绩效联系在一起,它通常被用来衡量制度的优劣,用来衡量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一致程度。依此而论,上述定义都有含混不清之处,或者说,容易使人片面地去理解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如果如科斯所说,交易成本是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那么,非市场经济里是不是就没有交易成本,尤其是在自给自足经济里,交易成本是不是就应该等于零,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是不是更有效率?显然不是。如果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信息成本,那么,哪一种信息成本影响经济制度的效率呢?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活动中,我们的目的是获得自然运动规律的信息,这当然也要耗费资源,这是交易成本吗?就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张五常的定义更具科学性,这一定义强调交易成本的社会关系性质,但是,张五常采用了一种否定式定义,内涵外延不易把握,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威廉姆森(1985)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的和作用都在于节约交易成本。但是,这里的混淆之处在于,一方面,我们说交易成本是制度运作的成本,制度决定和影响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制度分析中,诺斯等人(North,1980;Barzel,1989)又引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交易成本作为影响制度的成本因素。制度与

交易成本之间的循环论证使得我们难以把握交易成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一个明显的悖论是,按照以上研究者的理解,高效率社会中的交易成本要低于低效率社会的交易成本。但是,据 Wallis 等(1986)的估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 45% 应归于交易成本,这一比例比 19 世纪高出 25%。如何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成本剧烈上升这一事实,是制度更没有效率了吗?

上述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有必要变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与物质利益有关。从抽象层面来看,人获得物质利益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合作的方式获得财富,即参与社会分工,通过生产获得物质资料,并与他人交换;另一种是非合作的方式获得财富,即或欺骗或武斗,从别人手里夺取物质资料。很明显,如果每个人都诚实地生产,通过交换推进社会分工,这是社会利益所在,或者说是集体理性的表现,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理想境界。但是,对追求个体理性的人来说,合作生产并不总是最优的选择,非合作的方式可能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利益,社会理性并不会自动实现,典型的“囚徒困境”描述的就是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A	
		合作	不合作
B	合作	2, 2	- 1, 3
	不合作	3, - 1	0, 0

图 2

图 2 中,假定参与人 A 和 B 获得的支付均为净收益。对上面支付矩阵的说明是:如果 A 和 B 合作生产,则产生支付组合(2, 2);如果参与人 A 和 B 都不合作,合作净收益同时为零;如果 A 生产, B 掠夺或欺骗,那么 A 不但不能获得净收益 2,相反 A 的收益中属于成本的部分也被 B 夺走,所以 A 的净收益为 - 1,而 B 从事欺骗或掠夺,其收益为 A 失去的部分,其值是 3;同理可以分析 B 生产, A 掠夺的情况。上面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组合是(不合作,不合作),均衡的支付组合是(0, 0)。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不一致所导致的社会效率损失是 4。在均衡状态, A 和 B 没有交换,当然也不存在市场,也不会产生合作的净收益 4,社会潜在净收益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抵制,笔者认为,这种无形的力量就是交易成本。在这里,这种成本大于或等于 4,高于合作的潜在收益,所以合作没有发生。

很显然,对于 A 和 B 来说,这种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A 和 B 的福利都存在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如果我们引入一种制度安排,假设 A 和 B 双方都愿意服从 C 的权威,而 C 承诺为 A 和 B 的合作提供监督和保障,惩罚不合作的一方,同时, C 要为此收取一定费用。政府是第三方制度安排的一种形式。因为政府拥有暴力工具,所以政府具备裁判人的资质,政府从合作双方 A 和 B 那里获得收入,这就是税

收。在政府的暴力监督下, A 和 B 之间的合作就有了保证。假设政府从每人的净收益里征收 60% 的税收,此时 A 和 B 的净收益之和为 1. 6(每人均为 0. 8),高于不合作的净收益(0), A 和 B 的福利状况都改善了。政府获得的税收为 2. 4,对于 A 和 B 来说,这是一种合作的成本,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成本。在政府这一第三方制度安排下,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从大于或等于 4 降为 2. 4),社会效率状况改善了(从 0 上升到 4)。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从而,我们可以用社会交易成本的大小来衡量社会制度的效率状况,所以制度是重要的。当然,制度安排并非仅仅是指政府制度。

以上只是从静态的角度上来看问题,如果我们把由于分工导致的效率提升计算进来,那么合作的收益将更大,从而使得合作能够承担的成本(交易成本)也更大。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能够提升效率的三条理由:(1)分工导致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从而提高劳动效率;(2)分工节约了劳动者在不同工作之间进行转换的时间;(3)机械发明源于分工。

但是,分工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成本。如果坚持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假定,随着人的知识的日趋专业化,随着物质资产专用性的日趋提高,人们之间的合作成本也必然会在提高。这种不断提高的合作成本是一股阻碍分工的力量。在这里,这股阻碍分工的力量就是交易成本。如果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合作的成本,那么整个社会的分工就会继续向前推进,社会效率就会提高,从而,我们可以说,新的制度安排较以前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率。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解交易成本应该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出发,从博弈均衡的视角去考察。交易成本是分工合作的成本,它体现了人与人在经济利益方面的紧张关系,交易成本不仅存在于分工发达的经济里,体现在市场上;它同样也存在于分工不发达的经济里,自给自足经济里的交易成本是最高的。通常情况下,分工的发展有赖于对较高交易成本的突破,使经济体系从一种高交易成本状态进入一种低交易成本状态,实现这种转变的是制度,这也是我们判断制度效率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重要的。

三、交易成本与资源约束

在我们理解了交易成本的性质以后,我们下一步就要研究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是怎样被决定的。

承接上一部分的假定,人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方式:生产方式和非生产方式。很明显,如果人们更倾向于以非生产方式获得财富,在这方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该社会的交易成本就越高。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促使行为个体去选择欺骗或抢劫,而不是参与社会分工从事生产性活动呢?

我们假定,个人要获得生存资料,会面临两种选

择,要么加入劳动分工队伍进行生产,要么加入欺骗集团或者掠夺者集团(包括法定的政府)。理性的个体在做出选择的时候,要在这两种选择之间进行比较与权衡,看何种选择会给她带来更大的收益。我们假设存在两种生产函数:

一种是欺骗、掠夺生产函数,假设参与掠夺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可以忽略不计,该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Q=f(L_1)$;一种是财富生产的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 $Q=F(L-L_1,R)$ 。其中 L_1 是参加欺骗与掠夺的人数, L 是总人口数量, $L-L_1$ 为社会中参加生产合作的人数, R 为自然物质资源数量。

假设1:上述两种生产函数均满足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规律。

对于财富生产函数来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是微观经济学里的基础性内容,无需解释。对于欺骗、掠夺生产函数来说,欺骗、掠夺的人数越多,人们的防范意识也就越强,从事欺骗和掠夺也就越难成功;同时,在人口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从事欺骗、掠夺的人数越多,生产者也就越少,这样,掠夺者的收益也会下降。

所以有:

$$\frac{\partial F}{\partial(L-L_1)} > 0, \frac{\partial f}{\partial L_1} > 0, \frac{\partial F}{\partial R} > 0$$

$$\frac{\partial^2 F}{\partial(L-L_1)^2} < 0, \frac{\partial^2 f}{\partial L_1^2} < 0$$

假设2:从比较静态的意义上,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与人均资源数量正向相关。

对于财富生产者来说,他拥有的物质资源越丰富,他的边际生产力就越高,即有:

$$\frac{\partial^2 F}{\partial(L-L_1)\partial R} > 0$$

那么,理性个体在这两种选择面前,表示无差异的均衡条件是:

$$\frac{\partial F}{\partial(L-L_1)} = \frac{\partial f}{\partial L_1}$$

上述均衡条件可以用图3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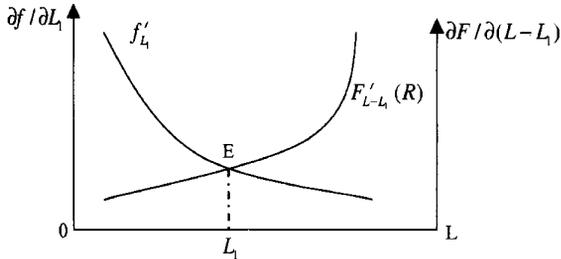


图3

上图中,绘制曲线 f_{L_1} 和 $F_{L-L_1}(R)$ 的根据是假设1,这两条曲线相交于E点,决定了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人数 L_1 。

由于非生产性活动的边际生产力($\frac{\partial f}{\partial L_1}$)单调递减,所以非生产性活动的边际生产力的大小($\frac{\partial f}{\partial L_1}$)决定了参加非生产性活动的人数(L_1)。非生产性活动的边际生产力的决定,除了函数 $Q=f(L_1)$ 本身的技术特性以外,又依赖于生产性劳动的边际生产力($\frac{\partial F}{\partial(L-L_1)}$)。生产性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于生产性活动的技术水平(函数形式 $Q=F(\cdot)$)与自然物质资源禀赋(R)。

命题1:技术水平越高,社会交易成本越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出现的可能性越大。

如图4,技术水平越高,生产性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 $F_{L-L_1}(R)$ 的位置越靠左上角,与非生产性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f_{L_1})相交所决定的非生产性劳动的人数越少($L_1 < L_1'$),从而,社会交易成本越低。交易成本越低,界定有效率产权的净收益越高,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越容易出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是技术决定制度,而不是“制度重于技术”(吴敬琏,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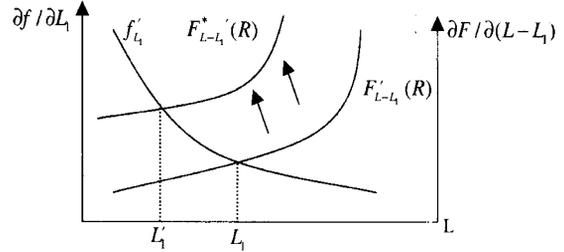


图4

命题2:物质资源条件越好,社会交易成本越低。

如图5,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性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直接决定于资源禀赋(R)。由于 $\frac{\partial^2 F}{\partial(L-L_1)\partial R} > 0$,物质资源越丰富(R 越大),生产性活动的边际生产力($\frac{\partial F}{\partial(L-L_1)}$)也就越大;又由于 $\frac{\partial^2 f}{\partial L_1^2} < 0$,由均衡条件 $\frac{\partial F}{\partial(L-L_1)} = \frac{\partial f}{\partial L_1}$ 可知, $\frac{\partial F}{\partial(L-L_1)}$ 越大,从事欺骗与掠夺的人数必然越少,社会交易成本必然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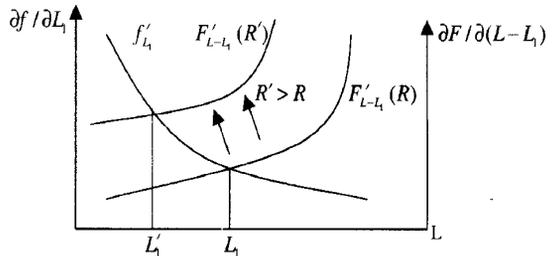


图5

从上述逻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技术水平不变或者进步缓慢的情况下,在一个封闭社会中从事欺骗或暴力活动的人数决定于该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源越贫乏,从事欺骗与暴力活动的人数也就越多,社会整体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对强硬政府管制的需求也就越大,出现大政府的机会也就越大。相对于大政府的规模和实力,个体显然不具有平等对话的可能,如果没有与统治集团相抗衡的力量,那么也就难以对统治集团的自利行为加以制约,宪政也就不具有可以自我实施的条件。

从分工的角度来看,资源约束会导致过高的交易成本,过高的交易成本制约了市场范围的扩展,从而限制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状况制约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从产权的角度来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依赖于

社会交易成本状态,而社会交易成本状态又受到资源的约束。产权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激励,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来说必不可少;同时,产权制度又内生于经济增长,产权的效率状态决定于经济增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可以用发展经济学家的一句话来概括上述逻辑:贫困的原因是贫困。

在我们认识到资源约束的重要性以后,我们可以对本文第一部分的逻辑框架图做一补充,如图6所示,标示意义同前。

从图6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闭环系统。这样,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从现象层面上看,产权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激励,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来说必不可少;同时,产权制度又内生于经济增长,产权的效率状态决定于经济增长。于是,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两难选择。

上述逻辑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要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必须要借助外力。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可用的外力不同,外力所作用的环节也不同。从这一意义上看,强调历史、强调文化、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价值的。资源禀赋,意识形态,以及产权制度都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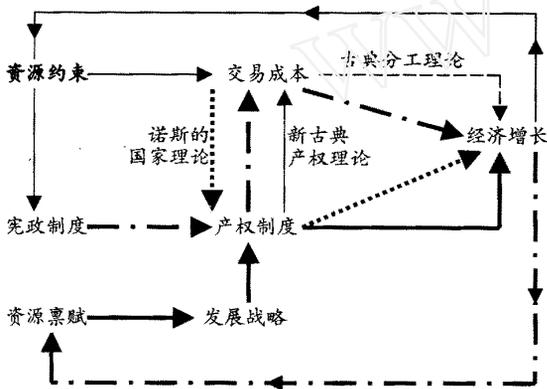


图6

四、对转轨的历史内涵的认识

无论是从诺斯的国家理论,还是古典的分工理论,结论是相同的:不同的资源约束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状态,不同的交易成本状态决定了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决定了经济绩效。同时,不同的交易成本状态又同样可能导致效率完全不同的产权制度,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内生于资源约束。

在我们得出经济发展(产权制度)与资源约束的关系以后,我们将会更加深刻地去认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意义。

工业化拉长了社会生产的链条,扩展了人类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种类和数量,改变了经济社会原有的资源约束状况,从而对一个经济社会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推动作用。在前面讨论过的简单模型中,

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取得技术进步的过程,突破了原有生产函数的形式,提高了生产性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提高了人们从事欺骗与掠夺的机会成本,约束了非生产性活动。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后发优势之一在于可以低成本的引进先进技术(相对于我们自身的技术),这为我们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快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

同时工业化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资源形式——资本(K),原生产函数转变为如下形式 $Q = F^*(L, K, R)$, F^* 表示技术进步以后的生产函数。

新资源——资本(K)的出现及其增长显然提高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partial F^* / \partial(L - L_1)$),这同样也提高了人们从事欺骗与掠夺的机会成本,约束了非生产性活动,降低了交易成本。

用同样的思路也可以来理解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释放了我国的人口压力,这同样会在机会成本意义上对欺骗等制造交易成本的行为形成约束。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替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出资本主义?笔者给出的解释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突破农业社会的资源限制,没有突破农业社会的白壳,就不可能产生一种自我加速的力量(刘伟,1995),这种自我加速来自工业化与产权激励的相互作用。黄仁宇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意即经过某种突破,从而使情事不可逆转。”

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试验,看一看在资源约束较强的封闭社会,私有产权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知道,私有产权与市场交换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也认为商品交换建立在私有制和分工的基础之上。在工业社会以前,最重要的物质资源是土地。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以后,统治者往往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以使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耕作效率不同,土地会逐渐集中,结果会使土地逐渐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从而使另外一部分人沦为佃农。按照市场分配原则,佃农按照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按照私有产权的逻辑,这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如果社会和平日久,人口持续上升,土地资源保持不变,以至于佃农的劳动工资低微到甚至不能饱暖时,社会上就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场面。这时候,尊严、诚信等价值观念就会在人们的心中丧失殆尽。如果从机会主义的行为假定出发,这时候,进行欺骗与掠夺就可能是比继续劳动更好的选择。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讲了一个假货的故事,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叫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我没有统计数

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青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了赚一只烤鸭的价钱,这种高成本低收入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这恐怕也是当时人生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

历史上最大的欺骗与抢劫集团就是政府,从而也是最大的交易成本制造者。在中国历史上,大政府出现的原因在于自然约束(黄仁宇,1997),这种自然约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从而使社会出现一种高交易成本状态,大政府的出现只是以一种交易成本形式(官僚)代替了另一种形式的交易成本(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一个朝代的兴旺在于开国皇帝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故而能对统治集团进行有效的约束,这种约束也有赖于皇帝在战争中建立的权威。而一个朝代的灭亡,则主要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失控,皇帝失去了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导致十羊九牧,这时候,博命集团也就出现了(吴思,2003)。中国在历史上向来重视思想教化,这种教化的作用也在于降低交易成本(诺斯,1981)。但是,在整个社会没有突破资源约束的前提下,这种正统意识形态终究敌不过代表物质力量的“潜规则”(吴思,2002),教化的作用也就非常有限了。

坚持逻辑的一致性,我们应该肯定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林毅夫提出的“资源禀赋——发展战略——产权制度——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但对发展战略与产权制度的关系理解不够深刻,二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双向的制约关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要解决的是资源约束问题,如果不解决资源约束问题,何以走出治——乱怪圈?虽然,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官僚体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交易成本,但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化体系也在我国建立起来。从释放资源约束这一角度来看,建国以后的强制工业化进程对我国的产权制度变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可以说,我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萌芽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因工业化而使其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前提。

出于同样的逻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意义也在于突破资源约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几种形式,如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方式。而且,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的,所以,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与国家是一体的,它本身就是国家(黄仁宇,1997)。迈克尔·佩罗曼指出,“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一股关键的力量”。

分析至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西方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建立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私有制不等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我们决不能仅仅从手段的层面来理解转轨,转轨的目的是发展,产权制度内生于发展,而发展又离不开有效率的制度,所以转轨同时有制度变迁和发展的含义,具体在我国,则是市场化

和工业化的含义。实际上,我国的渐进改革方式,就是要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基础上逐渐市场化,这也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从此出发,对于理解我国的经济转轨及其特征也很有帮助。

注释: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北京,三联书店,1987。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3.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3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4.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5.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中文版,41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 Barzel, Yoram, 1989.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Buchanan, James, 1980. *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November, pp. 386 - 405.
4. Dahlman, C. J., 1979. "The Problem of Externali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pp. 141 - 162.
5.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
6. 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 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8.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9.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中文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 Richter, R., 1989. *Lectures on the Basis of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and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Berlin - Heidelberg - New York: Springer - Verlag.
12.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3. Wallis, John J. and North, Douglass C., 1986.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 - 1970," In S. L. Engerman and R. E. Gallman (editors), *Long - 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4. 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15.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6. 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17. 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8. 杨小凯等:《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载《经济学季刊》,2001(1)。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Q)